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都市环境中的  
20世纪30年代诗歌

张林杰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都市环境中的  
20世纪30年代诗歌

张林杰 著  
导师 龙泉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环境中的 20 世纪 30 年代诗歌 / 张林杰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4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978-7-5004-6117-3

I. 都… II. 张…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114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张报捷

责任印制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假权必究



## 作者简介

张林杰 1959年9月生于贵州贵阳。1982年贵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5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文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先后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辑刊》、《江汉论坛》等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40余篇，曾出版《超越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审美空间》一书，并合作合译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等学术专著多部。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探讨了文化中心由北京向上海的迁移之后，新诗在20世纪30年代都市环境中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在这一环境中诗坛和新诗创作所发生的变化。

本书的论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从与都市环境的外部联系出发，探讨了那一时期诗歌的境遇，主要分析了商业因素与政治因素对于当时诗坛的深切影响，并对诗人的文化角色和诗歌的交流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通过诗人的具体创作，揭示都市环境对于他们创作心态的影响以及他们面对都市和乡村时的矛盾态度，由此展示了他们的现代性困境。与此同时，本书还通过诗人对于诗的理解的变化以及诗歌在具体视角、意象和语言技巧等方面出现的新特征，探讨了现代都市生活与30年代诗歌审美特征的关系。

#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学术秘书：冯广裕**

**天津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总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 12 年。这 12 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铁生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 序　　一

陆耀东

这篇文字，本应龙泉明君来写，因为他是张林杰君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这篇论文我“插手”不多，不是因张君未找过我（我记得的就有两次），而是我有如下考虑：怕我的意见与龙君相左。在这种情况下，照理说张君应尊重导师意见。他就会左右为难，这是我所不愿意的。所以，凡“隔代”研究生问我对论文课题的具体意见，一是泛谈，不具体表态；二是说明：我的看法只供参考，你应以导师意见为准。现在论文早已写成，并早已顺利通过答辩，授予张君文学博士学位，而龙泉明君却不幸壮年病逝，我不能推托，只有含泪勉力为之。

龙君长于综论，宏观展开，多有发挥，时有创造。我羡慕他这一方面的才华。张林杰君的这篇学位论文，设计上除受当时学术环境影响外，和他的导师治学特色恐有关系。论文主旨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都市环境中的新诗进行论述，谈及方方面面，且多有不同凡响之处。表面上看，都市诗歌的兴起与现代都市——上海——的形成似无必然联系，实际上大有关系。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自 1915 年《新青年》到 1927 年底，北京创刊的新文学刊物 19 种，上海创刊的 17 种。而 1928 年元月至 1930 年底，这三年上海创刊的文学刊物有 41 种，北京只有 4 种（南京、广州各一）。仅此，亦可看出，随着现代都市中心的南移，文学中心也在南移。

我注意到，作者要论述的是都市诗歌，那么，如何处理农村题材的诗歌，特别是写《烙印》时的臧克家？张君对此没有忽略，如实地说：

臧克家虽然还算不上那种典型的左翼诗人，但作为一位立足于反映现实的立场来写作的诗人，他在对诗歌社会职能的认识上，与当时左翼诗人的文艺观点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不过，在对于都市文明的态度上，他与其他左翼诗人却有着某种差别。他并不像某些左翼诗人那样，在理性的层面上，对现代都市文明表示推崇，而是十分自觉地强调自己与都市的距离，强调自己和乡土的关联。

接着，论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恰到好处。

我不会忘记，论文的主体，是论都市诗歌。因此，对 30 年代都市诗歌论述的广度、准确度、新意和深度，就成为衡量这部学术著作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论文涉猎的广度，有满意处，也有遗憾处。满意处史料颇丰富，如第七章，谈及“都市人视境中的乡土与自然”时，对艾青、王统照、钱杏邨、李白英、冯宪章、王亚平、蒲风、杨骚、温流、田间、郭沫若、臧克家、沈从文、施蛰存、孙作云、吴汶、陈江帆、史卫斯、侯汝华、徐迟、戴望舒、殷夫、路易士、何其芳、力扬、卞之琳（其中，有一些人是诗的评论者）等的诗作了精彩的评说。这些诗人在 30 年代，是很著名的，如路易士在 1949 年离开大陆前出版 9 本诗集《易士诗集》、《火灾的城》、《爱云的奇人》、《悲哀的日子》、《三十前集》、《出发》、《夏天》、《行过之生命》、《不朽的肖像》等。陈江帆在《现代》上发表诗作多，与戴望舒并列第一位，均为 18 首。仅此，亦可见其实力。

张君此文在这方面也有遗憾，例如注释中引自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37次，其中三分之一在武汉大学可以查到原文（不包括私人藏书），一般论文引用杨、刘的合编本是无可非议的（这书选编得好），但对博士学位论文来说，这似乎有点欠妥。

引文的准确性大都精审，但也有个别的版本欠比较考证，有待斟酌。

至于新意和深度，值得肯定之处很多，我不可能一一道及，从第四章到第八章，每一章都有论文作者的新发现、新感悟、新认知、新美感。例如第五章对殷夫诗的剖析，就很有新意和深度，也许学术界不完全首肯这种分析和评价，但至少可以感到一种新的理解的震撼，一种动摇传统观念的巨大力量在兴起。和这相近的还有对戴望舒诗的论述。我也欣赏论文对卞之琳的分析：

流连于北平的悠悠古韵、又在这古韵中感受着人生的无聊和苦闷，这使得诗人们常常不仅通过北平去寄托他们对传统文明的“凭吊”，而且也通过对北平生活的表现，来传达了他们对传统文明的批判态度。它同样反映了诗人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两难处境和矛盾心态。

把卞之琳及其诗置于复杂的“两难处境和矛盾心态”中，进行深深的发掘和细细的品味，这正是林杰君对卞诗赏味、分析的特色。

当林杰的笔锋掉转头向中国传统时，我总感到有点隔膜，如文章讲到“立德、立功、立言”时似乎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东西，不是中国古代观念，这也许是论文的小小瑕疵吧！

2006年12月5日

## 序二

吕家乡

我自以为对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诗歌阅读较多，有关的论著也读了一些，可是展读张林杰的新著《都市环境中的 20 世纪 30 年代诗歌》，还是感到一阵阵清新的风扑面而来。他把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诗歌和当时的都市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有前人未及的许多发现。常说研究可分两类，一类是开新地，一类是挖深井，张林杰的新著可以说是开新地与挖深井合一的佳作。

把新诗和城市环境联系起来研究，以前早有人这样做过。谢冕在《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年）中更贯穿着一个尖锐的基本观点：新诗的现代化倾向是属于城市、城市知识分子的，而与农民格格不入。在考察新诗的起伏曲折的经历时，他认为：从象征派到现代派，在西方现代诗观的影响下，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新诗开始接触并进入城市，实现着诗的划时代变革。谢冕所赞扬的这一阶段大体上就相当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可惜他没有展开论述，张林杰对一个相近的论题的考察则是翔实细致的。

张林杰的研究视角不但是城市学的，而且是诗学的。即使在本书第一部分作“外部研究”时也显示了城市诗学眼光。他所关注的不限于城市的政治斗争形势，而是更广阔的文化环境。通过文化环境的考察，他发现，当时的租界体制从某一方面来说有利于左翼文学（包括诗歌）的发展。他发现，上海的开放性使它便

于和国际新潮沟通，由此养成了文化人和青年学生赶新潮的心理；不仅现代主义被视为新潮，在“红色的 30 年代”国际潮流下，左翼文学也被视为新潮，因此现代派作家、诗人也都涉猎过革命创作。他发现，文化市场的存在不仅没有削弱左翼文学，反而有利于左翼文学的传播，因为当时左翼文学是畅销的文化商品。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少见的新解。他毫不动摇地把诗人当作诗人、把诗歌流派当作诗歌流派来考察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都市环境下的生态和心态。他不仅关注诗人、诗派在政治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更关注他们在城市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文化角色意识、读者意识。他指出：左翼诗人自觉承担起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以大众为预设的读者，因而自然要追求大众化。但实际的读者主要是有文化的市民和青年学生，这使他们不能不常常检讨和调整艺术策略。现代派诗人把“我”的角色定位为和政治保持距离的、个人化的“小我”，把诗歌当作自我体验的表达；但既然发表就有预设的读者，有意无意地迎合现代市民阶层对软性文学的需求。他们要求自己写出好作品来表示对读者的平等关系和尊重态度，于是力求沟通中西诗学，矫正李金发的象征诗作的“神秘”、“看不懂”的弊病。这些具有诗学意义的揭示，在过去的单纯政治视角下都成了被忽略的盲区。当作者进入“内部研究”即诗歌的本体研究时，更显出了这种城市—诗学眼光的深入穿透力。例如关于殷夫诗风的演变，我们过去只注意到他从早期的个人抒情转向中期的革命抒情和红色鼓动诗歌，又进入晚期的标语口号化。张林杰却另有发现：“在殷夫后来的诗歌中，诗人不再用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去观看都市人生，而是以一个普通的都市人姿态去投身于都市，投身于熙熙攘攘的人丛中。”他的《无题的》一诗，已经“通过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传达了一种新的美学感悟：……诗人不再徜徉于风花雪月的浪漫世界，而要在这个散文化的世界中去感受思考”；即使他的

一些标语口号化的诗歌也“没有放弃自觉运用现代的工业和机械意象来传达政治理念的尝试”。对殷夫在城市现代文明环境下审美习惯演变的如此入木三分的考察，使我们对鲁迅所说的“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有了美学意义上的崭新领会。这样立足于诗歌美学的考察贯穿始终，因此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比皆是。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在谈到某种诗歌现象时，总是把它放在纵横交织的坐标系上，既理清其来龙去脉，又通过左顾右盼的共时性比较显示其特质所在。张林杰的做法也许并不符合“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却也避免了某些刻意为之的比较研究的牵强附会，是基于平日丰富积累的联想和意到笔随的挥洒。例如谈到20世纪30年代诗美意识的特征之一——诗情体验对象“从自然转到日常人生”时，他首先指出生活于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古代诗人普遍具有亲和自然而并非征服自然的意识，抒情的“物态化”就是自然崇拜的诗学表现。接着指出五四时期的新诗开创者虽然喊出“做自然的老子”的口号，但是以自然为诗意图中心的惯性仍在延续，都市生活仍然排斥在诗意图世界之外。然后才指出，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诗人们的都市生活体验的增加，诗美意识的中心由自然转到城市日常人生。这里又对现代派诗人和左翼诗人的诗美意识的异同作了比较。进而指出，正是基于这种诗歌美学意识的新动向，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出现了对于浪漫主义诗潮的批判和反思，在此又对现代派诗人和左翼诗人的批判和反思作了比较。通过这样前后左右的比较、辨析，让读者对论题获得了清晰明确的了解。

张林杰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析，不论褒贬也都善于采用比较的方法。贬者如对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既然书名有意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就不能不把它和《恶之花》加以比较，指出波特莱尔写恶，不仅拒绝“把生活的空虚理想化”，还挖掘泥土中的黄金，透过坟墓去发现天国的光辉。而邵洵美的